

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 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

王 涛

摘 要：《德意志人物志》是德语世界关于历史人物信息的一部重要工具书。历史学家往往关注的是其实用层面的价值，而对这套大型工具书内容本身的研究并不多见。运用数字工具对人物志的数据挖掘，发现了德意志历史人物群体的隐含问题，甚至有悖于常识的结果，由此揭示出德意志主流历史学家对“德意志人”的想象构建。对大量德意志人物诞生地与逝世地的社会网络分析，构成了历史人物的“死亡地图”，清晰显示了德意志重要历史名城由南部向北部扩散的过程。在数字人文框架下挖掘《德意志人物志》的隐含信息，需要研究者既尊重数字方法的客观性，又要有结合历史语境的想象力。

关键词：德意志人物志 群体传记 德国 大数据

《德意志人物志》(*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以下简称 ADB) 是德语世界关于历史人物信息的一部重要工具书。它在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委员会 (Historische Kommission bei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主持下，历经三十多年编撰完成 (1875—1912)，共计 56 卷，收录人物信息约 26500 人。ADB 的编撰目的是协助学术研究，历史学家往往关注其实用层面的价值，而对这套大型工具书内容本身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在作了必要的学术梳理后，发现对《德意志人物志》的整体性研究极为薄弱，至多是对 ADB 编撰过程的梳理，或者对特定卷册的内容简介。^①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学者的研究习惯性关注 ADB 作为资料的实用

① F. A. Stafleu, "Review,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Taxon*, vol. 35, no. 2, 1986, p. 440. 在《德意志人物志》编写过程中，也不断有评论文章报告编者的思考、最新的进展和分卷的内容，比如 E. D.,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36, H. 2, 1876, S. 502-508. 《历史杂志》在 1886 年、1893 年、1901 年，报道了完成卷册 (1901 年已经完成了 45 卷) 的概括。从 1904 年开始，考夫曼 (G. Kaufmann) 连续在《历史杂志》上介绍最新进展，参见 G. Kaufmann,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d. 46 u. 47,"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92, H. 1, 1904, S. 89-95;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d. 48; Nachträge bis 1900,"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95, H. 1, 1905, S. 71-76;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50. Bd. Nachträge bis 1899,"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96, H. 3, 1906, S. 460-461;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51. Bd. Nachträge bis 1899,"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99, H. 1, 1907, S. 125-126;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55. Bd.; Nachträge bis 1899,"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108, H. 2, 1912, S. 337-339;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56. Bd. Generalregiste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115, H. 3, 1916, S. 582-583.

性，而忽略了从整体上把握这部大型工具书所蕴含的信息。二是即便有学者意识到 ADB 作为群体传记研究的价值，但在“数字人文”方法和思路得到认可之前，还找不到合适的角度切入庞杂的数据。本文试图作一次尝试，用新的思路与方法对《德意志人物志》进行挖掘，希望让德国史研究同行留意，以揭示人物辞典的另类价值。^①

一、工具书概貌

实际上，《德意志人物志》是能够充分折射德意志史学传统的经典项目。这部大型工具书的执行机构“历史委员会”，在德意志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推动下于 1858 年成立，其宗旨是促进德意志历史科学的发展。委员会成立之初，兰克就计划编撰一部助力德国历史人物研究的工具书，但并没有被即刻执行。约十年后，时任历史委员会主席的兰克旧事重提，并且委任里利恩克龙（Rochus von Liliencron）负责具体操办，不久又有威格勒（Franz Xaver von Wegele）加入，正式启动了这个庞大的计划，最初预计全套丛书有 20 卷，并于 1875 年出版第 1 卷。ADB 致力于为历史研究提供高标准的基础资料，不仅在文献保存方面成为标杆，也是德意志史学传统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呈现。^②其实，在第 1 卷前言，编撰者就坦言，虽然收录的人物囊括古今，但是对仍然在世的人物一律不收录。尽管这些人物可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编撰者顾忌的是，他们无法找到能够不偏不倚对这群人物进行历史定位的编写者，^③许多参与编写人物志的作者甚至是这些人物的门生或者至交，这样就很难用中立的态度进行书写，更谈不上兑现兰克史学观念中“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主张了。从这个意义上说，ADB 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德意志历史学家践行客观史学理想的具体案例。

不过，学界仅仅以工具书的态度看待《德意志人物志》，低估了“人物志”的学术价值，虽然 ADB 在编撰之初确实定位于工具书。然而，在更加开放的思路下，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解读 ADB 的意义。比如，人物入选的标准、人物传记的书写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等，^④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最初的设计中，ADB 的编委会曾经试图推进一项囊括 4 万人的庞大计划。在实际的工作中，编撰者意识到这个容量不太现实，随即就涉及如何取舍的问题。历史人物的筛选标准，往往又同如何界定“德意志人”紧密相关。在人物志的编撰过程中，关于德意志的认知确实存在扩大化倾向，既没有“局限在德意志的地理范畴”，也没有拘泥于德意志的民族性。收录的德意志人物，在时间跨度上往前可以追溯到公元 1 世纪的罗马时代，历史委员会的编委们用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他们对德意志早期历史的认知。从地理范畴看，有出生在奥地利、瑞士、波兰、捷克等地区的历史人物，这些区域曾经隶属于“德意志”文化区；也不乏来自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的人物，他们由于家族背景、诞生地、发挥主要影响等因素与“德意志”有千丝

① 关于“数字史学”在国内学术界的进展与问题的梳理，可以参见王涛：《数字史学：现状、问题与展望》，《江海学刊》2017 年第 2 期，第 172—176 页。

② Lothar Gall, Hrsg., „... für deutsche Geschichts- und Quellenforschung,“ 150 Jahre Historische Kommission bei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ünchen: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08, S. 22.

③ 这里使用的是电子版，参见 Rochus von Liliencron, Franz Xaver von Wegele, „Vorrede,“ in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herausgegeben von d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 bei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and 1, 1875, S. V – XVII, [https://de.wikisource.org/wiki/ADB:Vorrede_\(Band_1\)](https://de.wikisource.org/wiki/ADB:Vorrede_(Band_1)). 访问时间：2018 年 5 月 28 日。

④ 关于历史传记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参见孟钟捷：《魏玛德国“历史传记之争”及其史学启示》，《历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162—179 页。

万缕的联系而被 ADB 收录。换句话说,入选 ADB 的考量完全基于是否与“德意志”存在“紧密的精神关联下的共同的生活经历”,^①毫无疑问,这样的标准建构了一个外延极其宽泛的“大德意志”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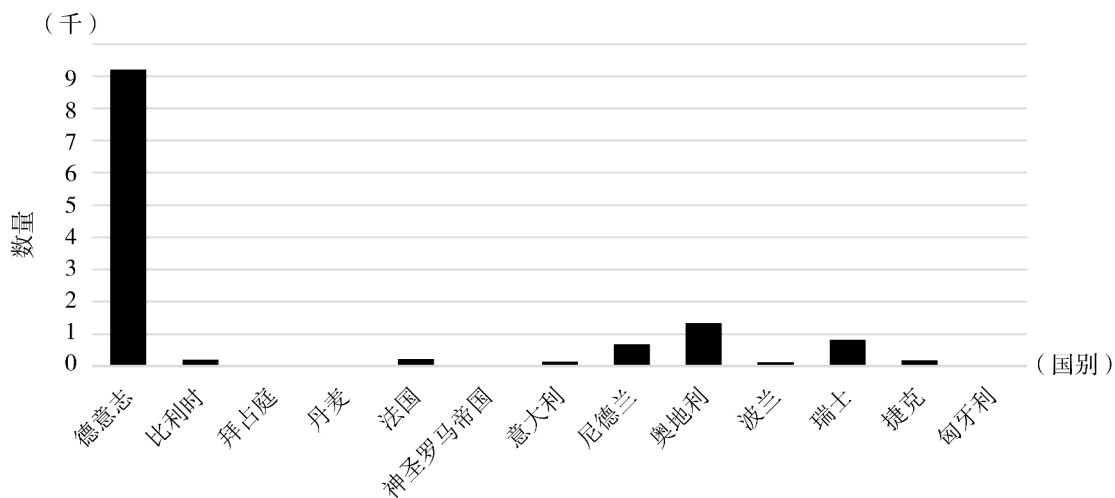


图1 ADB收录历史人物的来源^②

ADB 开始编撰的时候,恰好是德意志帝国统一不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政府来启动如此声势浩大的文科工程,难免让人怀疑与彰显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不无关联。兰克从一开始就将这项工作定位于记录“著名的德意志人”,从文化的角度激发“民族”自豪感是他没有言说的潜台词,但 ADB 的后续工作一直朝着编撰一部“国民传记”的目标迈进。实际上,早在“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的概念出现在德意志思想语境之前,^③ADB 就已经开始了塑造“民族纪念碑”(nationales Denkmal)的种种努力,“通过历史人物来呈现德意志在历史、学术、艺术、经贸等领域的发展”。^④

ADB 除了能够折射出史学观念的变迁之外,我们还可以用“群体传记研究”(Prosopography)的思路对历史人物进行解读。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向来就存在把具有相似出身、经历、思想、职业等群体并置在一起进行书写的习惯,如《圣经》的使徒列传、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世纪的圣徒传等。^⑤在学术的意义上,“群体传记”的概念在 1743 年就出现了,20 世纪 70 年

① Rochus von Liliencron, Franz Xaver von Wegele, “Vorrede,” S. VI.

② 本文涉及的图表与地图,除非特别说明,全部由笔者根据 ADB 的数据制作而成。

③ “记忆之场”的概念由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意指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探寻残存的民族记忆,以期找回法兰西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译本见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黄艳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关于德语学界“历史记忆”研究也有阿斯曼(Aleida Assmann)、尼佩尔代(Thomas Nipperdey)等人的推动。2001年,舒尔茨(Hagen Schulze)等学者开始编撰德意志历史语境下的“纪念地”(Erinnerungsorte),参见 Étienne François, Hagen Schulze, Hrsg., *Deutsche Erinnerungsorte*, München: Beck, 2001.

④ Hans Günter Hockerts, “Vom Nationalen Denkmal zum Biographischen Portal,” *Akademie Aktuell*, Heft 2, 2008, S. 19.

⑤ 国内已经有学者对英格兰乡绅群体进行了研究,参见陈日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绅修志”现象》,《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第46—59页。关于“群体传记”的介绍,见该文第50页。

代劳伦斯·斯通对这个概念的内涵给出了简洁的定义，他这样写道：“群体传记通过对历史上一群行动者经历的集体研究，探索这一群体具有共性的背景特征。”^①简而言之，“群体传记”关注某个社会群体的共性特征，研究者对相关群体提出一组相同的问题，通常需要收集被研究对象的姓名、生卒时间、地点、婚姻与家庭、社会出身、职业、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等信息。^②通过对各类信息的并列组合，研究者试图发现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找出思想史、建制史或历史演进的潜在模式。“群体传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于厘清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问题，往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随着电脑技术的进步，群体传记研究方法更加容易落实，不论是构建人物数据库，^③还是把地理信息系统（GIS）运用到历史人物的研究中，^④都能够看到数字人文技术与群体传记方法的相互配合。

不过，在运用群体传记方法对《德意志人物志》进行数据挖掘之前，有必要作一些预先的限定。首先是 ADB 的代表性问题。虽然 ADB 收录的人物在绝对数量上并不少，时间跨度也涵盖各个时期，但显然不是“全体德意志人”；虽然也收录了所谓“非凡的小人物”，比如激进的鞋匠，^⑤但往往也是由于他们参与政治活动、进行文学创作或者宗教思想等事迹载入史册，而非单纯的“鞋匠”身份。因此，“沉默的大多数”在 ADB 里毫无踪迹可循。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人物志》是样本量非常小的数据集，如果我们试图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来描述宏观层面的德意志历史，或许违背了统计学的科学性。然而，史学研究的规范模式在于，任何结论都要有史料支撑。所以，如果我们并不奢望用 ADB 的样本量来建构“全体德意志”的宏大叙述，这种定量的挖掘就并非毫无价值。而且非常遗憾的事实在于，任何历史问题的探寻，都不可能穷尽所有史料，搜集到尽善尽美的文献，专业历史学家都应该懂得如何在残缺的材料中按图索骥。

从另一个角度说，ADB 的体量确实比不过《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⑥但它成为人物群体显然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两万多名德意志人物被搜罗进来，是经过编撰者裁剪的结果，这个极其主观的梳理，构建的当然是德意志主流历史学家关于德意志人物的想象。在长达 30 多年的编撰工作中，先后有近 1850 名学者贡献了自己的智慧，^⑦让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共同体”的面向极其复杂与多元，但它究竟有哪些属性，存在哪些未知的隐秘信息，其实并没有出现在历史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中。我们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把类似的追问暴露出来，或许能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思考的灵感。

① Lawrence Stone, “Prosopography,” *Daedalus*, vol. 100, no. 1, 1971, p. 46.

② 刘兵：《关于科学史研究中的集体传记方法》，《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 年第 3 期，第 49 页。

③ Donald Jackman, “German Prosopography of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and the Advent of Data Analysis,” *History and Computing*, vol. 12, no. 1, 2000, pp. 23-29.

④ Peter K. Bol, “GIS, Prosopography and History,” *Annals of GIS*, vol. 18, no. 1, 2012, pp. 3-15.

⑤ 霍布斯鲍姆在研究“激进的鞋匠”时，提到德意志同样存在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鞋匠群体，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非凡的小人物》，王翔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年，第 28—73 页。ADB 至少为 8 名鞋匠作了传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反抗普鲁士占领布雷斯劳的杜博林（Johann Christian Döblin），参见 Colmar Grünhagen, “Döblin, Johann Christian,”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and 5, 1877, S. 274,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pnd135697964.html>. 访问时间：2018 年 5 月 28 日。

⑥ 截至 2018 年，CBDB 已经收录了超过 41 万个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参见徐力恒：《中国历史人物大数据》，《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2018 年第 4 期，第 19—24 页。

⑦ F. A. Stafleu, “Review,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p. 440.

二、群像的描绘

ADB收录的每个历史人物都是一个鲜活的个体，但是他们聚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整体。我们试图以“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鸟瞰视角，从整体上为ADB的历史人物作群像素描，来描摹他们的共性特征，勾勒“德意志人”的剪影。

（一）人口学的统计

基于常识，我们就能理解ADB收录历史人物的时段分布并不均匀，这需要在进行量化分析时做一些取舍。从图2可以看到，虽然ADB涉及的人物最早可上溯到公元1世纪，但是在14世纪之前历史人物的数量过于稀疏，并不具备统计价值，因此不会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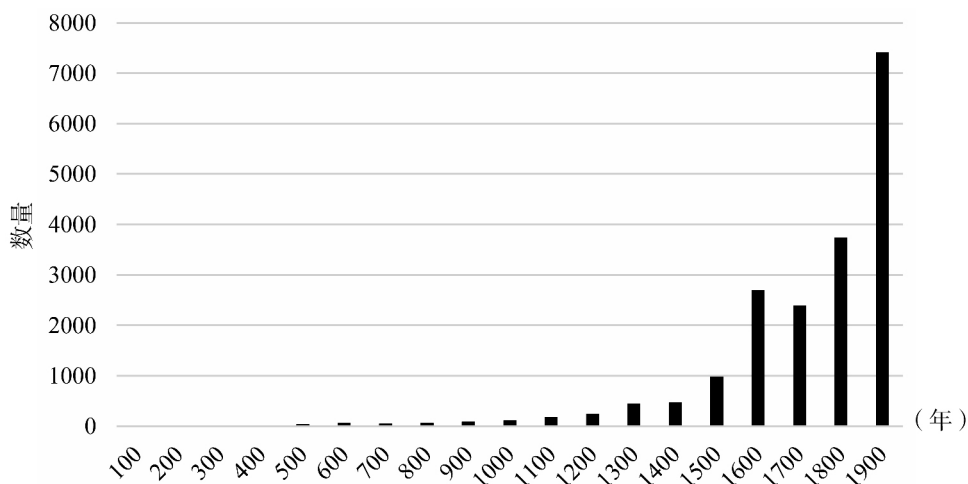


图2 ADB收录历史人物的年代分布

如果我们试图透过ADB了解德意志社会的普遍状况，或许会南辕北辙。毫无疑问，人物志的编者有自己的一套主观标准来筛选收录对象。如果要兑现兰克所谓“著名德意志人”的要求，ADB显然无法涵盖平头百姓。所以，基于这种特异性样本的量化分析，只能让我们看到德意志语境中社会中上层的状态。这是我们时刻需要注意的前提。另外，参与ADB编撰的都是职业历史学家，他们经过科班的学术训练，当然懂得ADB需要提供准确的信息才具有价值。对于收录的历史人物，编者都经过多方考证，力图信息的完整和准确，但仍然无法排除有些数据存在遗漏，比如，生卒年份等人口信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将尽量剔除那些明显模糊的、有歧义的信息。

群体传记特别在意人物寿命的趋势。整个ADB收录的历史人物将近26000名，生卒年信息准确的辞条达到2万人，平均寿命数值为63.29岁。这个数字或许远远超出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想象。不同学者根据多种信息来源，对欧洲历史上人口状况有过宏观层面的描绘。总体上看，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一直在低水平上缓慢增长，古典时代的平均寿命只有18岁，中世纪达到20岁，18世纪提升到30岁，直到一战结束的20世纪初，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55岁。^①如果我们

^① Thomas L. Baier, *Lebenserwartung im Mittelalter*, <http://www.dorflinger.de/index.php/home/dorflinger-blog/beitraege-von-dorflinger/67-lebenserwartung-im-mittelalter>. 访问时间：2018年5月28日。

将空间范畴缩小到德意志，时间截至 19 世纪，ADB 当中历史人物的平均寿命仍然比总体德意志人的平均数高出不少。按照有学者的估算，德意志帝国建立后普通德意志人的寿命为 35.6 岁；^①根据另一些学者的数据，如图 3 所示，19 世纪的平均寿命也只有 39.46 岁，而 ADB 的数值高达 62.94 岁。实际上，2015 年一项对 30 万历史名人的研究明确表明，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普通人的平均寿命明显低于历史名人，后者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开始有比较显著的预期寿命提升，比普通人群的寿命提升开始得更早。^②

当然，具体到个别历史人物，总是存在超出平均值的个案。长寿者中，有 1 位百岁老人，^③90 岁以上的高寿者接近两百人（他们主要分布在 18、19 世纪）；活了 83 岁的歌德，活了 74 岁的弗里德里希大王（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用现在的观点看，都算得上高寿之人。同样也存在英年早逝的历史人物，其中包括莫扎特；^④更有许多还未成年就已夭折的王室成员，比如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公国的王子海因里希（Albrecht Heinrich, 1742-1761），由于意外伤害，不满 20 岁就去世了。^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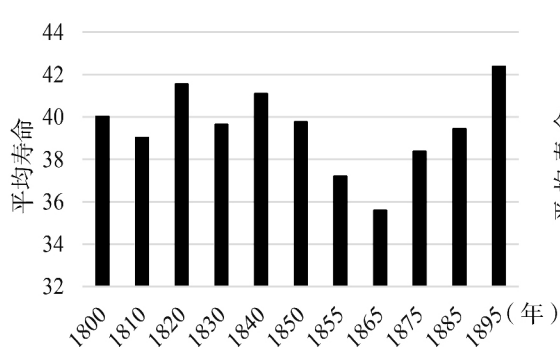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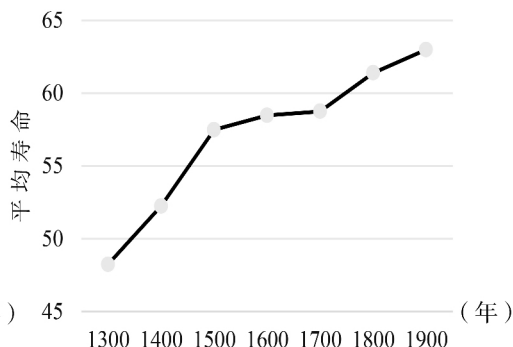
图 3 德意志人的平均寿命^⑥

图 4 ADB 的平均寿命

- ① Reinhard Rürup, *Deutschland im 19. Jahrhundert, 1815-1871*,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2, S. 28.
- ② David de la Croix, "The Longevity of Famous People from Hammurabi to Einstei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0, no. 3, 2015, pp. 263-303.
- ③ 完全依据 ADB 数据的话，百岁老人有四位。但是，许多信息存在谬误，比如 ADB 收录了一位名叫阿让托（Argentau）的军官，享年 105 岁，参见 Wilhelm Edler von Janko, "Argentau, Eugen Graf von,"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and 1, 1875, S. 524,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gnd138541205.html>. 访问时间：2018 年 5 月 28 日。实际上，ADB 弄错了阿让托的出生年，不是 1714 年，而是 1743 年。所以，比较没有争议的寿星是享年 100 岁的法学家、政治家戈尔曼（Heinrich Dietrich von Grolman），参见 Teichmann, "Grolman, Heinrich Dieterich von,"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and 9, 1879, S. 713,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pnd11686298X.html>. 访问时间：2018 年 5 月 28 日。
- ④ 参见 Ludwig Meinardus,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and 22, 1885, S. 422-436,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gnd118584596.html>. 访问时间：2018 年 5 月 28 日。
- ⑤ Ludwig Ferdinand Spehr, "Albrecht Heinrich,"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and 1, 1875, S. 265,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gnd104183764.html>. 访问时间：2018 年 5 月 28 日。
- ⑥ 数据来源：Arthur E. Imhof, Hrsg., *Lebenserwartungen in Deutschland, Norwegen und Schweden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94, S. 411.

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全体德意志人的平均寿命被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拉低，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过着平凡的生活，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值得被纳入 ADB。这个群体要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但只能生活在“简陋的泥棚或木棚中，用茅草作屋顶。他们的食物只有黑麦面包、麦麸粥、豌豆、扁豆；饮料只有水或者乳清；身穿毛毡蔽体御寒……”^①毫无疑问，这样的生活条件根本无法保证良好的生命预期。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导致健康水准的不平等，已经是现代社会学通过大量数据得出的结论。^②虽然这样的研究主要基于工业革命之后的数据，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的原理可以解释前工业化时代贫富差距引发的健康差距。在前现代的德意志社会，抢掠、战争、天灾等都可能引发农业歉收，由此带来的营养不良是底层民众的常态，考古学家发掘中世纪墓穴中的尸骨显示，佝偻病在民众当中相当普遍，而它是与缺乏饮食紧密相关的疾病。^③总而言之，整个社会食物短缺，贫穷之人受到的冲击更甚，良好的生活习惯无从谈起，更容易出现心血管系统方面的严重疾病。^④如果说这些因素是决定生命质量与寿命长短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 ADB 当中历史人物的物质条件、生活方式等要比同时代的普通人领先是不争的事实，由此造就了寿命的不同也就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贫富差距引发的健康差距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从 18 世纪 70 年代开始，德意志出现了一股“民众启蒙”（Volksaufklärung）浪潮，其核心宗旨是企图改善乡村民众的生活方式，达到提升民众生存质量的目的。民众启蒙思想家开出的药方包括：在农业生产方面进行技术革新，以此提高粮食产量来消灭贫困，以及向乡民推广公共卫生知识与健康的生活习惯。为此，德意志印刷业迎来了“民众读物”的出版热：据统计，到 1800 年左右，与医学知识、卫生习惯相关的读物达到 1000 种，可见启蒙思想家的热情。^⑤这个历史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启蒙精英（大多数人在 ADB 中占有一席之地）有他们所认同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的人均寿命远远高于普通民众的重要原因。

社会上层人物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寿命的绝对数值上。我们从历时性维度，可以看到两个群体在宏观层面的巨大差异。图 4 表明 ADB 群体在平均寿命上是一个缓慢增长的态势，这个画面似乎与我们熟悉的历史背景不太贴切。我们能够理解的德意志人口的演进过程，具有明显的断裂与延续的阶段，如图 5 所示，在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存在两次明显的人口锐减，适逢黑死病的肆虐以及三十年战争的侵袭：德意志地区至少 20% 的人口减少与黑死病直接相关，而由三十年战争引发的人口锐减达到 20%—45%，有些地区如符腾堡（Württemberg）甚至损失四分之三的人口。^⑥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给德意志带来沉重打击的三十年战争，对 ADB 人物的

① Johannes Janssen,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at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vol. 4, London: Paul, 1900, pp. 358-359.

② Patrick Bernau, “Soziale Ungleichheit: Arme Menschen sterben früh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4. 3. 2016, <http://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arm-und-reich/soziale-ungleichheit-arme-menschen-sterben-frueher-14105632.html>. 访问时间：2018 年 5 月 28 日。

③ Ernst Schubert, *Essen und Trinken im Mittelalte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6, S. 13.

④ Robert-Koch-Institut, Hrsg., *Armut und Gesundheit*, GBE kompakt 5/2010.

⑤ Heidrun Alzheimer-Haller, *Handbuch zur narrative Volksaufklärung. Moralische Geschichte 1780-1848*,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4, S. 57.

⑥ 参见 Geoffrey Parker, “Crisis and Catastrophe: The Glob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considere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3, no. 4, 2008, p. 1058. 三十年战争带来的损失存在地区差异，参见 John Theibault, “The Demography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Re-Visited; Günther Franz and His Critics,” *German History*, vol. 15, no. 1, 1997, pp. 8, 16, 20.

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在 ADB 当中似乎没有呈现；至于其他一些烈性传染病，比如天花，也选择性地隔离于社会上层。根据我们的统计，在整个 ADB 的 2 万多人名中，死亡原因跟天花直接相关的只有不到 11 人。^①反而有大量医生由于在对抗天花传播、改善疫苗接种等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被收录到 ADB，比如维尔德（Peter Wilde, 1732-1785），年轻时本有志于法学研究，后来感染天花，痊愈后弃文从医，开设医院，治病救人，并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推广当时最先进的天花治疗方法。^②

ADB 的人物，极少从事直接的劳动生产，却分享了最大多数的“蛋糕”，让他们具备了享受良好生活方式的条件，生命质量与寿命预期均有品质保障，成为社会进步实质的获益者。ADB 呈现出来的人物寿命数据，直白地暴露出历史最残酷的一面：民众往往是战争、瘟疫等天灾人祸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普通民众被历史的车轮无情碾压，连一份文字记录都未曾留下来，最终成就了 ADB 量化分析中的数据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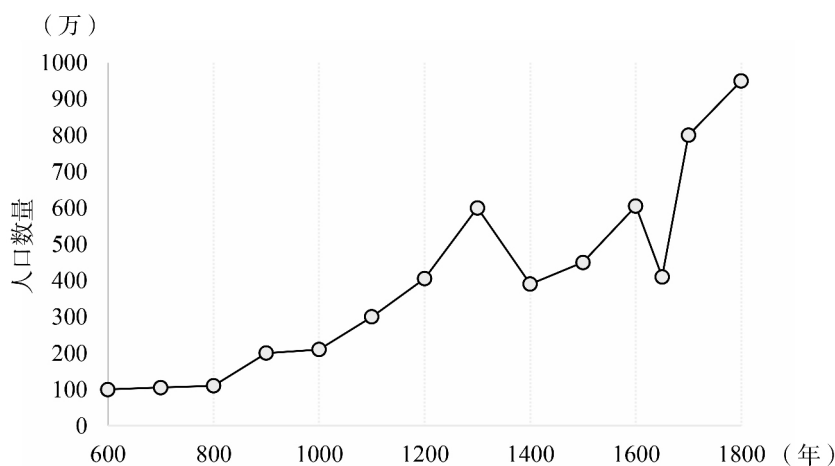


图 5 欧洲人口发展趋势^③

职业是否也是影响预期寿命的因素？这个角度非常有意思，但统计起来存在难度。首先，许多历史人物的职业身份是多重的，比如莱布尼茨，他作为哲学家、数学家、外交官等身份在历史上都留下了印记。好在这些职业尽管在专业技能上存在诸多差异，但都可以归到“专业人员”的大类属性下。对于其他具有“跨界”身份的 ADB 人物，我们归纳出世俗贵族、宗教人士、专业人员以及手工业者等四个类型，以最大可能地涵盖不同的身份。在把平均寿命与职业类型进行关联之后，我们得到如下数据：

- ① 当然，根据史料记载，也有不少上流社会的成员罹患天花等恶性传染病，甚至会导致整个家族的灭亡，比如萨克森—阿滕堡（Sachsen-Altenburg）的公爵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年仅 15 岁就死于天花。但总体而言，上层人物抵抗疾病的能力要强得多，参见 August Beck, “Friedrich Wilhelm III,”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and 7, 1878, S. 794,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gnd118953346.html>. 访问时间：2018 年 5 月 28 日。
- ② Ludwig Stieda, “Wilde, Peter Ernst,”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and 42, 1897, S. 496-498,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gnd102668981.html>. 访问时间：2018 年 5 月 28 日。
- ③ 数据来源：Hagen Schulze, *Germany: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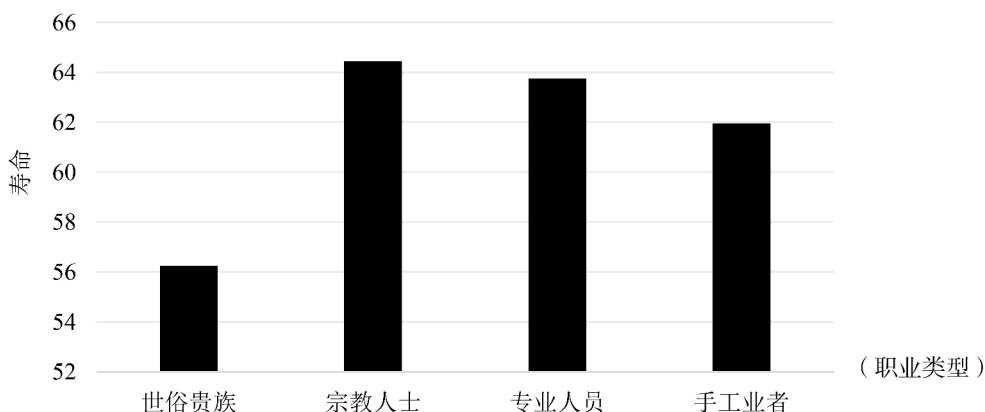


图6 职业与平均寿命

图6揭示的信息非常有趣,有一些符合我们的常识判断,比如手工业从业者比专业人员的平均寿命要低,但也有些现象让我们感到意外:德意志的世俗贵族是平均寿命最短的群体。毫无疑问,世俗贵族是德意志历史上享尽各种特权的一类人,但政治特权并没有直接兑换为良好的生命预期。反观宗教人士,虽然他们舍弃了尘世的一些权利,却收获了较高的生命质量,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取舍。相比较而言,专业人员和手工业者凭借一技之伴生,过着小富即安的稳定生活。

当然,世俗贵族与宗教人士在寿命上的差距令人费解。因为在神圣罗马帝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化中,贵族与神职人员的边界其实非常模糊。神职人员,特别是主教、修道院长等享有一定宗教权力的教会诸侯,往往是贵族出身,更有亲王主教(Fürstbischof)这种兼顾世俗统治权与教会控制权的身份。在贵族家庭的政治实践中,长子继承贵族头衔,次子就不得不去教会。宗教改革时期的威廉(Wilhelm)家族就是如此,威廉五世(Wilhelm der Reiche,1516-1592)是尤里希—克莱维—贝格联合公国(Vereinigte Herzogtümer Jülich-Kleve-Berg)的第二代继承人,他的长子卡尔(Karl Friedrich,1555-1575)最初继承了公爵爵位,甚至被当时的罗马教宗寄予厚望,意图对抗新教势力。可惜卡尔英年早逝,已经在明斯特(Münster)担任主教的弟弟约翰(Johann Wilhelm,1562-1609),放弃了在教会进一步晋升的机会,回到家族继承公爵头衔。^①所以,像约翰这样具有跨界身份的人,如何将其归类,一定会影响两类群体的状况。我们用他们最终的身份作为归类的依据。

如何去解释贵族群体的短寿现象非常具有挑战性。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这是由传记编撰者刻意选择的结果。贵族与其说是职业,不如说是一种身份,一出生就能获得;但是像科学家、手工业者等职业,需要经历足够长的专业训练,一定要在成年之后获得业务头衔;即便是宗教人士,也往往要等到成年后才有机会。所以,未成年而夭亡的历史人物,基本上都是贵族出身,他们被收录到ADB,拉低了这个群体的平均寿命。例如,乔治·威廉(Georg Wilhelm von Liegnitz,1660-1675)继承了皮雅斯特(Piasten)王朝的血脉,当年只有15岁,去世时同时

^① 参见 Felix Stieve, "Johann Wilhelm,"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and 14, 1881, S. 228-230,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gnd129674850.html>. 访问时间:2018年5月28日。

兼任利格尼茨 (Liegnitz)、布里格 (Brieg) 的公爵。^①威廉之所以能够被人物志收录, 完全由于他的公爵身份, 因为这个年纪在平常人家, 还看不出将来要成为学者还是修士。简言之, ADB 当中贵族群体的平均寿命最短, 或许并不是因为贵族更加短寿, 而是因为他们的数据更加准确。而其他类属的群体, 没有那些拉低平均值的人物, 因此造成人均寿命更长。当然, 单纯只有这个因素不可能导致平均寿命的差距高达 6 年。如果把那些未成年就夭折的人物排除 (18 岁成年), 平均寿命仍然是贵族群体最低。我们还需要找寻其他解释。

从基因、遗传的角度能够解释得通吗? 毕竟, 欧洲贵族家族间的通婚非常频繁, 一些隐性的遗传疾病, 在经过几代人的发酵后, 会以强大的方式显现出来。比如, 源自维多利亚女王的血友病基因, 曾经困扰许多欧洲皇室。^②然而,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 贵族与神职人员在很大比例上来自同一个阶层, 具有相似的身体素质, 人均寿命应该差别不大。所以, 从生理学角度进行解释, 并不能说明问题。

因此, 生活方式反而成为影响生命周期的重要原因。在很多情况下, 世俗贵族与宗教人士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 但两种身份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世俗贵族常常以各种理由举行庆典活动, 每逢庆典必定有盛宴, 音乐和杂耍,^③酒肉穿肠过的纵欲早就透支了健康, 还要面对各种勾心斗角的政治博弈, 宫廷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生活场景。教会框架下的宗教人士并非伏尔泰笔下只会“吟唱、吃喝、消化”^④的慵懒之士, 修道院的生活规律而单纯, 食物只为果腹, 而不是为享口腹之欲, 还有各种宗教的清规戒律所要求的禁食; “祈祷与劳动”的传统让修士的日常生活充盈着祷告、读圣经、手工劳作等属灵的维度, 令人无暇顾及俗物的羁绊。总而言之, 入世与出世的状态, 带来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意境, 也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命预期。

这个假设也可以找到科学研究的依据。大量的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研究从不同角度证明, 社会关系对人的寿命会带来直接影响。良好的社会关系、适度的人际交往会让人享有比较健康的生活质量和比较长的生命预期, 而紧张、矛盾、焦虑的社会关系则给人的生命周期带来负面影响。^⑤勾心斗角的人际关系除了带来心理上的负资产外, 也会给肉体带来实质性伤害: 死于政治暗杀的比例, 在贵族群体中显然高于其他类型。比如荷兰伯爵弗洛里斯五世 (Floris V, 1254-1296) 在 42 岁时被谋杀, 壮年而逝, 其子约翰一世 (Johann I, 1283-1299) 也未能摆脱政治暗杀的宿命, 年仅 15 岁就死于政治斗争,^⑥荷兰伯爵的血脉甚至就此绝嗣。另有西方学者对欧洲国王

① Carl Krebs, “Georg Wilhelm,”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and 8, 1878, S. 696-698,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gnd115395792.html>. 访问时间: 2018 年 5 月 28 日。

② Evgeny Rogaev et al., “Genotype Analysis Identifies the Cause of the Royal Disease,” *Science*, vol. 326, no. 5954, 2009, p. 817.

③ 汉斯·维尔茨·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 王亚平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2 年, 第 211—225 页。

④ John Merriman, *A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W. W. Norton, 2010, p. 319.

⑤ Julianne Holt-Lunstad and Timothy B. Smith,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Mortality Risk: A Meta-Analytic Review,” *PLOS Medicine*, vol. 7, no. 7, 2010, pp. 1-20; Yang Claire Yang and Courtney Boe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Longevity across the Human Life Span,” *PNAS*, vol. 113, no. 3, 2016, pp. 578-583.

⑥ P. L. Müller, “Florens V,”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and 7, 1878, S. 126-129,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gnd119360675.html>. 访问时间: 2018 年 5 月 28 日。

寿命的长时段研究表明,皇族有非常高的暴力死亡率,22%的国王死于非命。^①由此可见,贵族身份其实是一个高风险职业。一个更加显著地影响贵族群体寿命的因素是战争。贵族的身份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当政治斗争不得不用战争来解决的时候,贵族就化身为战士,成为保家卫国的天然承担者。由贵族身份而引申出来的义务,一直到一战还有延续。这场被称为“大战”的战争,消耗了欧洲贵族大批生力军。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世俗贵族出逃进入修道院,恰恰是为了逃避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或者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失意者而已;^②但这种生活场景的转换,无心插柳柳成荫地让这些人士从紧张的人际关系过渡到相对静默的生活方式,从此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质量。

(二) 诞生—逝世地的网络模型

ADB当中历史人物的另外一组基本信息,是他们的出生地与逝世地。在数字人文研究领域,最为津津乐道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SNA)。^③但是,“社会网络”不应该被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任何能够发生关联的事物,比如瘟疫的流行、观念的传播、商品的流通、信息的传递等,都能够组成网络结构,值得我们关注。基于ADB的信息,不同历史人物从出生地到逝世地的走向,组成了一张最简单的网络,而且具有方向性;^④借助可视化工具,我们能够将其中隐秘的信息暴露出来,勾勒历史人物迁移的图景,从而推演德意志中心城市的生成。需要强调的是,ADB中涉及的地名由于时间跨度大,还存在古今地名不统一等因素,无法实现所有地名一一还原经纬度。本文的研究只考察可以找到经纬度信息的地名,虽然会损失很多数据,实属无奈之举,但这也能让计算结果更加精准。我们的统计显示,诞生地与逝世地都出现了相对集中的情况,即某些地点诞生了更多历史人物,或者某些地点更多的人在这里逝去。出生地涉及的地名有近1900个,远远多于死亡地名,后者不到900个,我们已经能够想象出一幅画面:ADB的历史人物从“大德意志”区域内分散的地点,逐步向几个中心城市汇聚。我们把这些因素作为加权项体现在可视化图例中,制作成德意志历史人物的“出生地图”和“死亡地图”,获得了更多有趣的发现。

图7呈现的最直观信息是中心城市的凸显:莱比锡、德累斯顿、慕尼黑、柏林等城市诞生了更多ADB人物,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显然,从现代政治疆域看,维也纳、布拉格、巴塞尔、苏黎世、萨尔茨堡、柯尼斯堡等城市超出了联邦德国的范畴,但是它们出现在“出生地图”和“死亡地图”的排行榜,充分说明“德意志”范畴在历史上的纵深。ADB编委无疑试图强调这些地点在历史上与德意志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图7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认识到,“大德意志”与“小德意志”的竞争具有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有相对集中的中

① Manuel Eisner, “Killing Kings Patterns of Regicide in Europe, AD 600-1800,”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 51, no. 3, 2011, pp. 556-577.

② 比如曾经当过查理大帝宠臣的艾因哈德(Einhard, 770-840),在查理帝国解体后,不堪忍受宫廷的各种阴谋,主动退隐于塞利根施塔特(Seligenstadt)修道院,直到840年去世,参见Wilhelm Wattenbach, “Einhard,”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and 5, 1877, S. 759-760,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gnd118529560.html>. 访问时间:2018年5月28日。

③ 林聚任:《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方法与应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④ 我们的研究主要基于ADB的信息,对德意志历史人物的流动作了一个微观的案例分析。本文与希赫(Maximilian Schich)于2014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有相似之处,希赫团队进行的是更加宏观的研究,时间跨度大,区域范围广,参见Maximilian Schich, “A Network Framework of Cultural History,” *Science*, vol. 345, no. 6196, 2014, pp. 558-562. 我们的研究相互印证。

心城市的存在，但从整个德意志的范畴看，城市的分布与发展相对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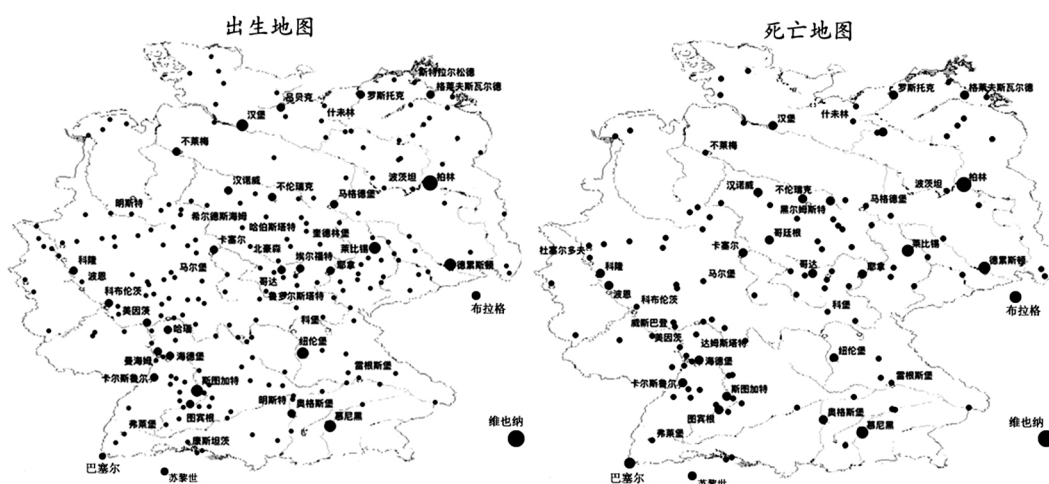


图7 德意志的“出生地图”与“死亡地图”

巧合的是，通过从“出生地图”到“死亡地图”的流向分析，我们发现这个轨迹与德意志主要城市高度吻合。ADB的人物有很大一部分人出生在乡村、名不见经传的小城、边陲地带，但他们最终选择在大城市建功立业。这个结果证明城市发展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人才的流动往往遵循从低到高的模式，逆向的流动极其罕有：大城市吸引了各路人才安家落户；聚集起来的人气，反过来又推动了大城市的不断发展。一波又一波新鲜移民的进入，让这样的大城市在历史的沉淀中越来越重要。



图8 15世纪与18世纪“死亡地图”对照

除了宏观意义上德意志中心城市的生成之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细节信息。在把时间轴信息加入之后,我们发现:城市的吸引力随着时代而发生改变。对比15世纪与18世纪德意志的“死亡地图”,我们清晰地看到由南部向北部扩散的过程。这个趋势刚好对应着普鲁士的崛起,以及柏林逐步登上历史舞台:①图8展现了柏林逐步演进为中心城市乃至德意志首都的轨迹。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对照图中看到纽伦堡、维也纳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德意志城市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不容忽视。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距离,即计算出生地与逝世地在地理空间上的长度,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来分析历史人物流动性的时代变迁。当然,这个数据存在天然缺陷,我们不能用它来推算历史人物的所有轨迹,因为许多历史人物在有生之年游历了不少地方,比如伊拉斯谟,出生在鹿特丹(Rotterdam),卒于巴塞尔(Basel),年轻时他在巴黎求学,后来游历剑桥、弗莱堡等地,②地点转换的总长度,远远高于从生到死的单向度流动距离。同时,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经纬度坐标精度的不同,会影响距离的测算,结果的误差在若干千米之内都是常见的情形。不过,从出生到死亡的平均距离确实反映了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从13世纪开始,平均值从140千米逐步增长到19世纪的230千米。同时,整个ADB人物的生死距离的平均值为210千米,也高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半径。据学者对中世纪社会史的研究,普通民众可能终其一生都在自己隶属的庄园、城镇,生活半径极其有限,唯一长距离的旅行可能只有朝圣。③兴盛于18世纪的“大旅行”(grand tour)则是只有贵族才有财力与闲暇支撑的游历,意大利等胜地对歌德这样的ADB历史名人也充满吸引力。④当然,进入19世纪后,随着火车和轮船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普及,普通民众的活动空间也得以扩大,而这是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副产品,为各个阶层的人群带来了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自由与文明”。⑤

另外,我们可以利用RAG数据库,⑥分析“大学生”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深度描绘他们的流动性。RAG项目组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1472—1550年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大学生的流动存在明显的由北向南趋势,⑦这个进程同德意志城市的“死亡地图”刚好相反。在大学生的流动过程中,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成为重要的结点,背后的因素或许有政治的相似度,

①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Cambridge, M. 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中译本参见克里斯托弗·克拉克:《钢铁帝国:普鲁士的兴衰》,王丛琪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② 关于伊拉斯谟在弗莱堡的经历,可以参见王涛:《“心怀二意”的伊拉斯谟?——以六年的弗莱堡生活为例》,《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114—126页。

③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④ 关于“大旅行”的简介,参见彼得·赖尔:《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刘北成、王皖强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66页。歌德的意大利之旅,中文节译可参见歌德:《意大利游记》,周正安、吴晔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

⑤ 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金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7—120页。

⑥ 我们在这个部分的分析使用了另外一个主题人物数据库,即Repertorium Academicum Germanicum,简称RAG,由瑞士伯尔尼大学(Universität Bern)以及德国的吉森大学(Justus-Liebig-Universität in Giessen)共同开发的数据库项目,收录了1250—1550年间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大学注册、学习过的历史人物,是研究欧洲中世纪大学史的重要资料。根据最新统计,该数据库已经收录了近5万人的信息,参见<http://www.rag-online.org/>。

⑦ Christian Hesse, “Universitätsranking und Gelehrtenmobilität im Mittelalter,” *Akademie Aktuell*, Heft 2, 2008, S. 15-18.

许多人更加认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当然，这个时间区间与宗教改革重合，也是让英戈尔施塔特大学变得更具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大学恰好成立于 1472 年，是巴伐利亚地区得到罗马教宗特许开设的第一所大学，这奠定了大学的天主教立场。所以，宗教改革时期，与马丁·路德发生过激烈交锋的天主教对手艾克（Johannes Eck）在此任教（直到 1543 年去世），^①让英戈尔施塔特成为反宗教改革的中心，也让信仰保守的天主教徒倾向于在此学习。

三、类型分析：职业变迁的时代特征

在对德意志人物群像作了素描之后，我们有必要对具体的人群作深度分析。职业身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ADB 当中涉及历史人物的职业名目繁多，许多人还具有跨界情况。为了方便分析，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对于具有多重职业身份的历史人物，就以 10 年为界，把所有从事过的职业都统计进来，以勾画一幅完整的职业图景，如图 9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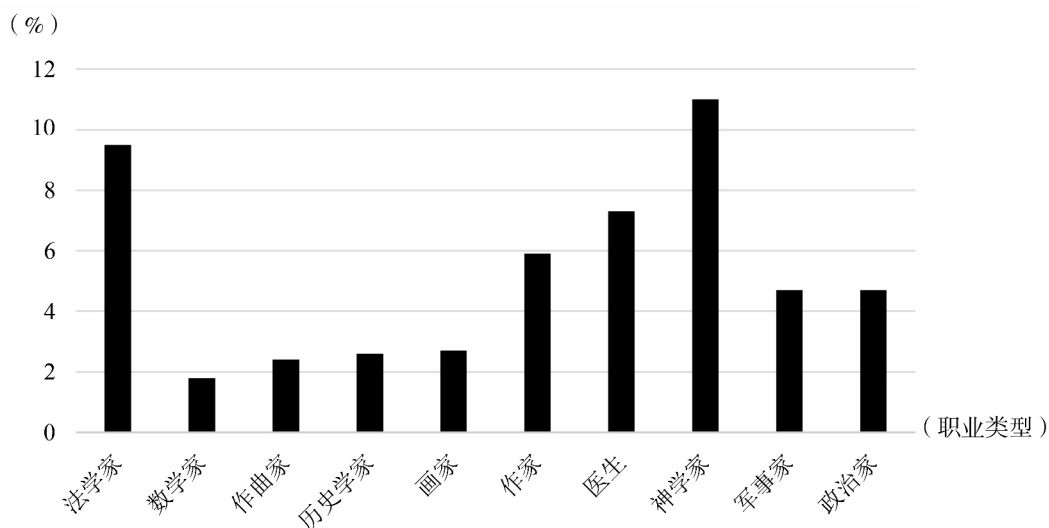


图 9 ADB 收录职业类别

我们发现一个有悖常识的现象。许多涉及德意志的现代通俗读物，往往把德意志描绘成哲学家的国度。这种错觉或许源自大众媒体的宣传，一些期刊杂志推出的文化议题，会刻意强调德国古典哲学的价值，在各种评选德意志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排名时，马克思、康德等哲学家通常作为名列前茅的人物进入大众视野。另外，德意志从 18 世纪以来确实为人类的精神世界贡献了大批哲学家，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至今还要拜莱布尼茨等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所赐。然而，透过对 ADB 的观察，德意志盛产“哲学家”的表述似乎是一种神话，虽然从学术渊源上讲，“哲学家”同“神学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 ADB 的编撰者给历史人物贴上不同的标签，必定有他们的充分理由。我们基于这样的数据，发现了这样的事实：在排名前十的职业中，“神学家”、“法学家”才是真正代表德意志人水准的职业（如果把作曲家、作家、画家等都

^① Adolf Brecher, “Eck, Johannes,”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and 5, 1877, S. 596-602,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gnd11852870X.html>. 访问时间：2018 年 5 月 28 日。

贴上“艺术家”的标签，人数最多的职业其实是“艺术家”）。我们对于“神学家”脱颖而出并不感到意外，施特伊德林（Karl Stäudlin）早在1804年就提到德意志文化的一些关键特征，“德意志在总体上是非常宗教化的民族，他们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比其他民族更加深刻……没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那样在宗教问题上投入如此多的精力、体验和耐心。”^①与此同时，除了医生、数学家算得上具有理科背景的群体，大部分德意志人都是文科背景出身，这个现象也证实了许多学者的猜测，德意志的立国是一群文人首先在纸面上构建起来的。^②

就职业的整体状况而言，ADB给我们提供了10世纪以来的丰富数据，如何从它们当中挖掘出有效信息？美国学者默顿（Robert Merton）用量化分析方法研究17世纪英格兰的职业状况，为我们带来了启示。默顿试图找到17世纪英国科学异军突起的原因，他通过职业转换的宏观研究发现，17世纪英国科学的加速发展与当时英格兰社会精英的职业兴趣转移存在关联。^③在德意志人物志的语境中，世俗职业的变化是否也能反映时代变迁的特性？为了分析方便，我们重点关注四类职业，它们分别是艺术类、人文类、宗教类以及科学类。

先看16世纪以前的职业状况：首先，宗教类职业一直居于强势地位，对德意志人的吸引力远远高于科学类工作，而且科学类工作在很晚才开始出现。

其次，人文类工作增速明显，特别是在14世纪人文主义革命兴起以后，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宗教类工作，大有赶超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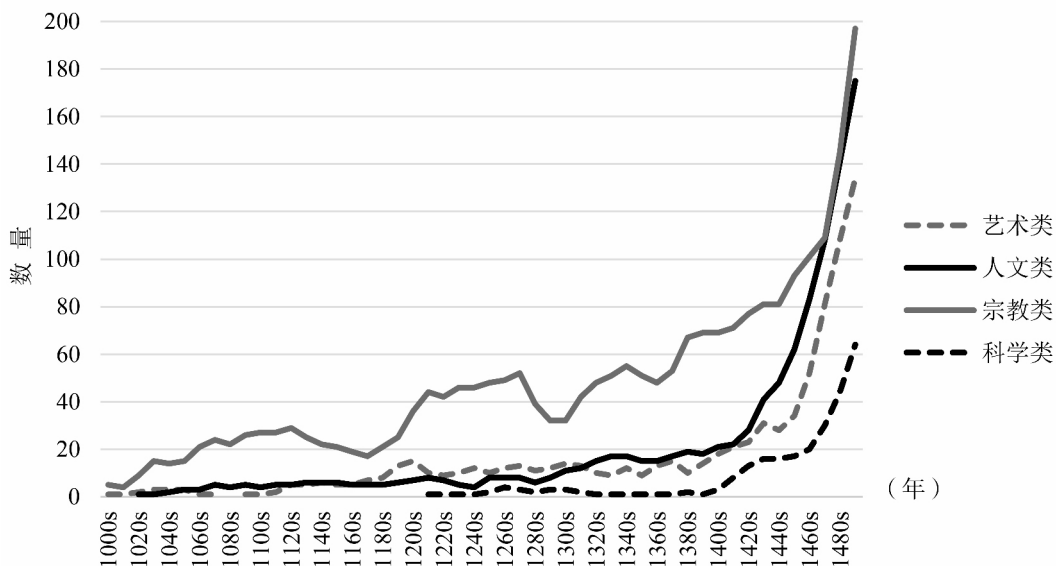


图10 16世纪之前的职业趋势

16—18世纪近三百年的趋势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有几个时间节点尤其值得关注。宗教

① Karl Stäudlin, *Kirchliche Geographie und Statistik*, Band 2, Tübingen: Cotta'schen Buchhandlung, 1804, S. 324-325.

② 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49页。

③ 罗伯特·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70页。

改革之前，宗教类行业对人的吸引力一如既往地强烈，大部分人选择了与宗教相关的职业；但是在宗教改革时期，艺术类的工作发展起来。

启蒙时代是一个全新时期，人文类工作变得时髦起来，很快就超过宗教的吸引力。科学类职业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长河里，一直不温不火地缓慢增长，终于在 18 世纪末，首次超过宗教类工作，这可以被认为是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但同默顿关于英格兰的研究进行横向比较，ADB 的职业变化曲线显示了德意志社会独特的风格，这或许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在职业吸引力上的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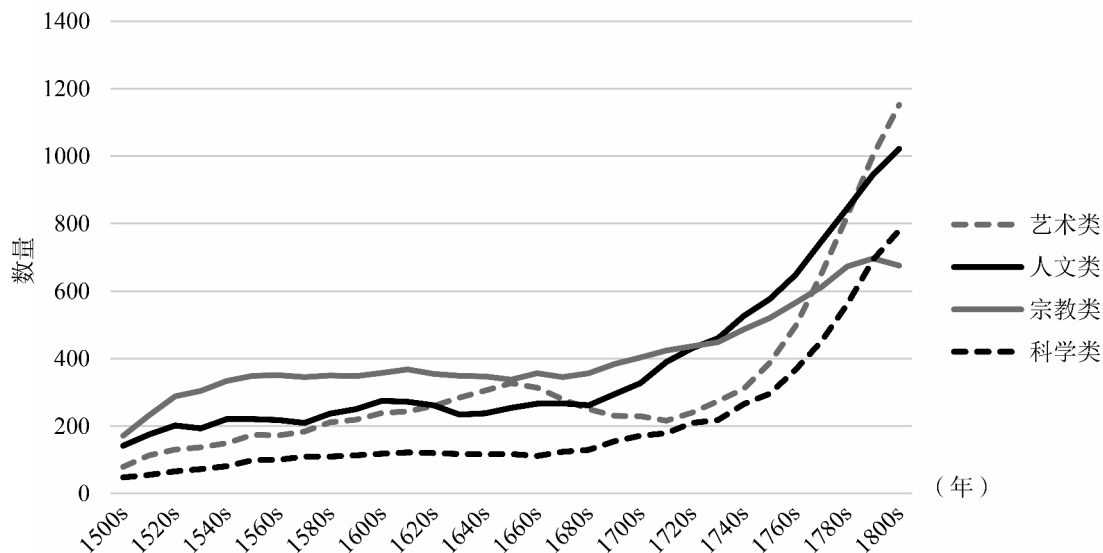


图 11 16—18 世纪的职业发展趋势

对一些小众的职业群体而言，比如出版业、商业、手工艺等行业的人，他们与时代的变迁存在更加紧密的联系。在图 12 中我们看到了 15 世纪古腾堡的印刷术发明之后，出版类工作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的过程。据统计，到 1500 年，德意志的印刷出版社就超过 1000 家，^①吸引了大量从业者。但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它也跟其他行业一样受到极其严重的打击。同样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出版类工作再度兴旺发达，出现了所谓的“媒体革命”，真正迎来了“图书工业”的春天。^②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商业类工作在 18 世纪后的迅速增长，它同“民众启蒙”的理念有暗合之处。启蒙思想家认为，国家的福祉跟民众的经济状况紧密相关，所以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帮助民众实现财富增殖，商业活动得到空前重视，^③图 12 的趋势彰显了独特的时代面貌。

① Georges Renard, *Life and Work in Modern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12.

② 在德意志地区，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每年出版的新书逐年递增，到 1800 年，每年有 3560 本新书出版。可以说，图书工业的从业人员极大地推动了“启蒙”理念的传播，甚至带来了被学者称为“阅读革命”的现象：拉丁语的书籍由 18 世纪 40 年代的将近五分之一，降至 19 世纪初的区区 3.9%，神学类的书籍由超过半数，下降到不足 13%，参见 James von Horn Melton, *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86-92.

③ Holger Böning, “Entgrenzte Aufklärung: die Entwicklung der Volksaufklärung von der Ökonomischen Reform zur Emanzipationsbewegung,” Holger Böning, Hrsg., *Volksaufklärung. Eine praktische Reformbewegung des 18. und 19. Jahrhunderts*, Bremen: Lumiere, 2007, S. 1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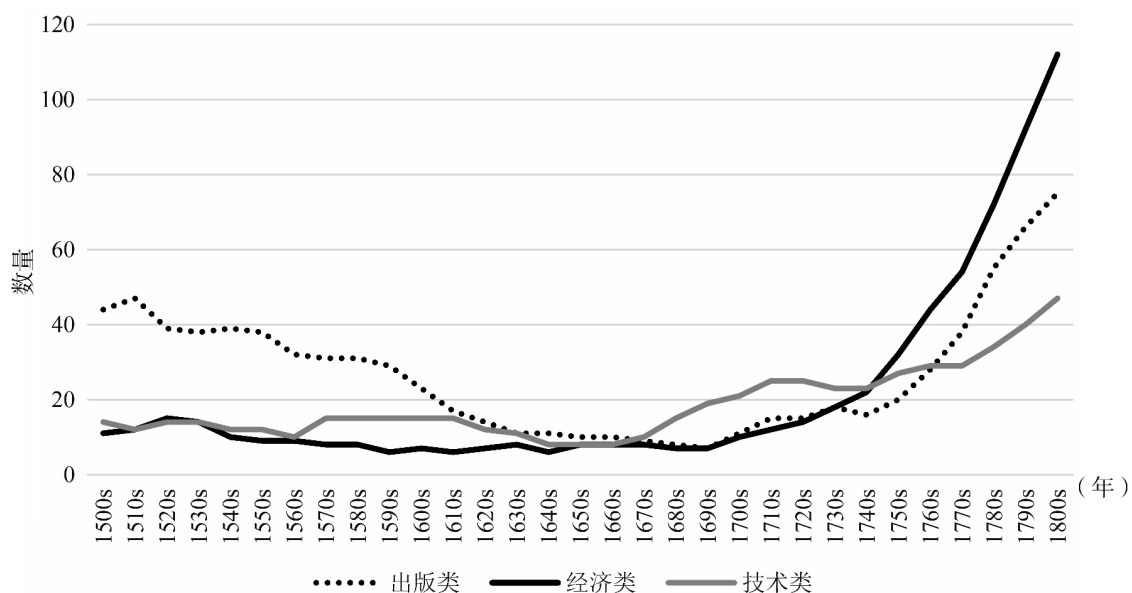


图 12 其他行业的趋势

最后，我们还可以将历史人物的职业身份与“死亡地图”结合起来，发现城市的多重属性。我们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德意志城市，考察它们是否呈现出对不同职业的吸引力。预设的前提是，不同的职业能够展现城市的不同维度，通过计算在某个城市死亡的不同职业的人数，我们就能够实现对城市属性的描述。我们将统计的结果制作成图 13 的示例，获得了几项重要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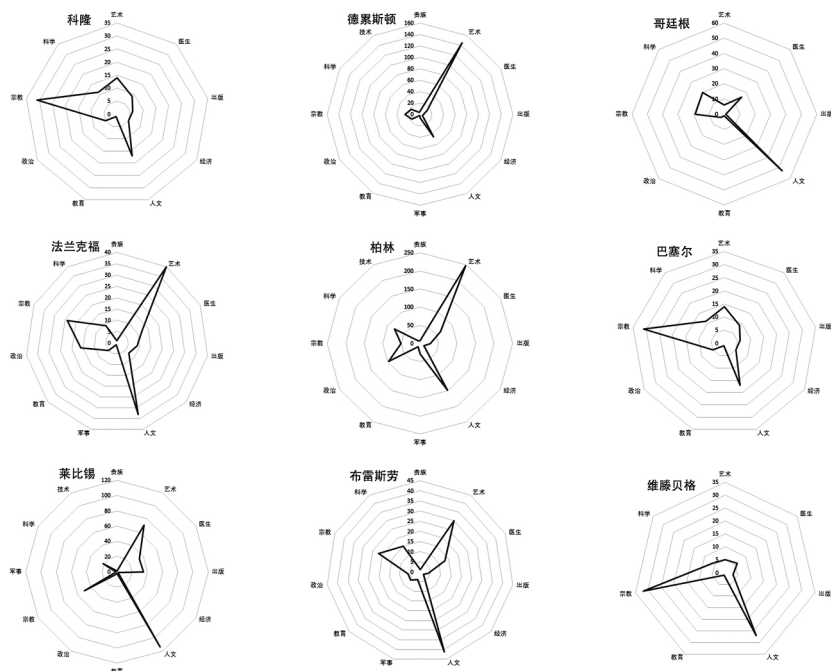


图 13 以职业为导向的城市属性

我们选择的这几个城市分布在德意志的不同区位，既有德意志的核心区域，也有“大德意志”范畴的巴塞尔以及布雷斯劳（Breslau），既有大都会如柏林，也有小城镇如维滕贝格（Wittenberg）。总体而言，德意志的城市发展比较均衡，对许多职业都有吸引力，展现了它们的开放度。然而，通过更加仔细的解读，我们找到了有趣的隐含信息：艺术家更倾向于选择大城市，比如柏林、法兰克福，而像德累斯顿这样的艺术之都，从历史的维度看也并非浪得虚名。哥廷根则汇聚了各路学者，成就了它作为“大学城”的意义，以及它在德意志大学史上的重要地位。^①而科隆大主教座堂在科隆的地位，也影响到这个城市的职业趣味；当然，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重要的三大教会封建选侯之一，城市的宗教和政治维度得到了强化。柏林以及法兰克福贡献了不少政治人物，与它们在政治史方面发挥的作用不无关联。莱比锡则在德意志启蒙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里有大量的思想家以及出版商。^②

结 语

人物始终是推动历史演进的主角，传记资料是我们理解历史发展脉络的重要线索。所以，ADB 具有特别的示范作用，学界也越来越重视人物资料的整理工作。ADB 工程在 1912 年完结后，德国学界于 1953 年启动了 ADB 的升级补充版《新德意志人物志》（*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随后，在历史学领域还出现了试图囊括更广泛人物的传记资料汇编，包括运用数据库方法，将与人物相关的资料透过“关系型”数据库思维整合起来的努力，并用互联网的开放思维，实现相关资料的免费共享。在得到德国科学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的支持后，德国学界开展了更加庞大的“德意志人物”（*Deutsche Biographie*, DB）计划，不仅扩大了“德意志人”的外延（截至 2015 年，DB 总计收录了 50 万历史人物的信息），^③还在技术形态上对人物传记的呈现方式进行换代，日益成为德语世界重要的“历史人物信息系统”。^④毫无疑问，人物数据库愈庞大，数量愈丰富，能够说明的问题就愈详细。

不过，无论人物数据扩大到何种规模，其容量总是“残缺的”；它们在统计学上永远只能是“全体德意志人”的一个子集，对这个子集进行研究的价值难免会受到是否具有“代表性”的质疑。推而广之，这种质疑会连带地指向“数字人文”方法的有效性。从逻辑上看，数字人文的方法在实施过程中，只要数据是真实的，算法是合理的，哪怕得到的结果有极其严苛的前提，甚至以传统学者的眼光看来略显拙劣，也应当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此同时，两万多历史人物

① Thomas Biskup, “The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and the Personal Union, 1737-1837,” in Brendan Simms, ed., *The Hanoverian Dimension in British History, 1714-18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8-160.

② Hazel Rosenstrauch, “Leipzig als Centralplatz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in Wolfgang Martens, Hrsg., *Leipzig, Aufklärung und Bürgerlichkeit*, Heidelberg: Schneider, 1990, S. 103-124.

③ Matthias Reinert and Maximilian Schrott, “From Biographies to Data Curation: The Making of *www.deutsche-biographie.de*,” in BD2015, *Biographical Data in a Digital Worl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on Biographical Data in a Digital World 2015,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April 9, 2015, CEUR Workshop Proceedings, Vol-1399, pp. 13-19.

④ Hans Günter Hockerts, “Zertifiziertes biographisches Wissen im Netz. Die Deutsche Biographie auf dem Weg zum zentralen historisch-biographischen Informationssystem für den deutschsprachigen Raum,” *Akademie Aktuell*, Heft 4, 2012, S. 34.

的资料,或许并没有“大数据”的体量,但其中隐藏的信息,也不是用传统方法就能够轻易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以 ADB 为代表的历史文献而言,我们并不缺乏信息,而是缺乏发现有效信息的手段。所以,数字人文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能够为研究者激活一种新的历史眼光,正如鲁滨孙 (James Robinson) 鼓吹“新史学”的概念,强调历史研究要综合借鉴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成果来分析历史问题一样,作为 21 世纪的史学工作者,我们也可以尝试让数字人文作为“历史的新同盟”^①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给历史阐释带来更多可能性的呈现。

需要强调的是,数字人文方法被运用到历史研究层面时,并没有谋求对历史问题作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与所有其他方法一样,它只能有限地解决某些问题。但是,数字人文能够带给我们新的历史眼光,对历史研究无疑是有益的尝试。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于,如何将基于量化的结果转化为符合历史认知的解释,而不是生硬的相关性分析,^②否则就有沦为数字游戏的危险。这需要研究者既尊重数字方法的客观性,又要有结合历史语境的想象力。

附识: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展开之所需数据,来自于《德意志人物志》这套工具书。笔者用 Python 编写代码,对文本化的数据进行了结构转换,将涉及的人物姓名、职业、生卒年、出生地等信息作为字段,用 Excel 制作成电子表格,形成一个小型数据库。本文所有涉及的统计研究,都基于这张 Excel 表格。如果有读者感兴趣,可以与笔者联系索要原始数据。

在方法上,本文采用最基本的统计方法,涉及的算法有平均值、统计频率等,都可在 Excel 中使用相应的函数实现。从数据分析的角度看,这是最低限度的一种“数据挖掘”。

“诞生—逝世地的网络模型”使用了“社会网络分析”的概念,用 Excel 作统计,最终用 QGIS 软件制图。

〔作者王涛,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 210023〕

(责任编辑:焦 兵)

① 鲁滨孙:《新史学》,何炳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58页。

② 正如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加里·金 (Gary King) 教授在某次演讲中提到的那样,在大数据时代,重要的是对数据进行合理分析,而不是大数据本身。参见 <http://www.sipa.sjtu.edu.cn/info/1103/4391.htm>. 访问时间:2018年5月28日。如果研究者不能用恰当的方式分析数据,就会得出“人均鸡肉消费量”与“原油进口量”具有正相关的荒谬结论。

Nuclear Arms, US-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 of the Cold War Zhao Xuegong(123)

In World War II,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the atom bomb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meant that the two shared a monopoly of nuclear weapons. Although the main reason the US launched a nuclear attack on Japan was to reduce its military casualties and shorten the war, this act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US-Soviet relations.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fiercely contested the preservation or abandonment of the nuclear monopoly.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regarded the atom bomb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achieving its political and foreign policy goals, toughened its Soviet policy, while the Soviet Union adopted a tit-for-tat approach and sped up it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their political and propaganda needs, both sides expressed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but in fact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positions and their refusal to compromise meant that this move ended in failure. Although nuclear weapons were not a Cold War product,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llapse of the alliance among the US, Britain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d War.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Group Portraits and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German Prosopography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within a Digital Humanities Framework Wang Tao(148)

German Prosopography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work for information on German historical figures. Historians tend to focus on its practical value, rarely addressing the content of this large-scale reference set. The use of digital tools to mine prosopographical data reveals hidden information on German historical figures and may even bring up results that disagree with common knowledge, thus aid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mainstream German historians'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ined "German." Large-scal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networks reflected in the places of birth and death of these historical figures provides a "mortality map" that clearly shows the spread of major German historical cities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Researchers using a digital humanities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information hidden in *German Prosopography* need not only to respect the objectivity of the digital method but also exercise an imagination that crosses historical contexts.

Academic Review

Beyond Cold War History: A New Trend in Research on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Zhai Tao(167)

Early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old War propaganda basically saw US propaganda of the time as a Cold War product that originated in and served the Cold War. With the advent of the 21st century, there has been a tendency for research to "go beyond Cold War history," as scholars try to explore the origins of Cold War propaganda in the pre-Cold War era and look at factors that lie outside Cold War logic and historical mechanisms. They believe that whether it be Cold War propaganda ideas, measures and media or 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work ethic, or even historical role and status, such propaganda contains a great many pre-Cold War elements and a logic that differs from that of Cold War politics. Therefore, research should start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on the 20th century. This trend reflects the return of the "longue durée" i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a renew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ropaganda.

Historical Note

The Statutory Frequency and Duration of *Seyi* (Special Services and Corvée Labor)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u Shuguo(178)
